草席荣千年 愿能世代传

风 物

仇赤斌

“东乡一株菜，西乡一根草”，说的是旧时鄞县东乡邱隘附近以种植、加工榨菜闻名，而西乡是以种席草、做席出名。草席以古林的最有名，但儿时，邻近的洞桥等地也几乎家家户户做席。

先要种席草。席草，那时全是本草，亦叫“灯芯草”。头年的11月小雪节气前后把席草种到水田里，和种稻差不多，到次年7月小暑时收割。所谓“小暑割草，大暑割稻”。最后要留下一片做草种，只割去顶部的部分，留着根部。割后要晒，把席草成扇状地晾晒在平地上。收翻席草的工具叫草钩，竹竿上带个弯钩，省得弯腰。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晒三次，每晒一次后要捂一捂，再接着晒。通过三次翻晒后，把干草拢成15公斤左右的一大捆，用稻草覆盖捂住贮藏备用，保管时要保持好湿度，严防受潮。保存妥善的席草颜色碧绿，像是刚割时的样子。

除了席草，主料还有麻筋，做经线起支撑作用。一条1.5公斤重的席子，要用到四五两的麻，麻越多，席子越结实。农家自己种麻的也不少，选用旱地，立夏种下，白露时收割。收割时把麻连根拔起，运回家，马上就开始剥麻。麻秆很脆，在根部附近折断后，取出麻骨，用刀刮一下，或是用刨刀刨去麻头附近的杂物，使之平滑，刮好后就挂在晾竿上晒。制作麻筋时，用小刀把麻条破开，变成2厘米宽的细长条。最早做麻筋的工具是“断筋串”（音），后来有了纺麻车，轻松了许多。通过机器，两根细麻条绞在一起，细的麻筋算是做好了。而席子的两边需要的是粗麻筋，还要再搓纺。

把麻筋穿过压筘的眼子，在席机的上下部位串好线，宽度视要制作的席子而定。本地人以“攀”来计量，最短的32攀的宽度约70厘米，还有54、56、58、62攀，最宽的是66攀约1.5米。麻筋串好后，远望过去，像是密密麻麻的一张大网。

席草在编织前，要手指抹去根部的席壳，再在水中泡一下，很快席草从干瘪的状态变得饱满、挺括，富有韧性，不易折断。编织时两人一组，配合默契。一个人坐在席机的正面，进行压筘。筘有两面，要朝上朝下地交替操作。另一人坐在席机的右侧叉草，手拿替臂，这是一根细细长长的竹制品。叉草人把草往“替臂”的口子上一掾，穿入“席筋”中间，将草送入头后，马上将“替臂”抽回来，压筘人立即把筘压下，同时把伸露在席筋处的草根拗进。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如行云流水一般。

木制的筘重达4公斤，必须要用力抬起、压下，这样编织出来的草席才紧实耐用。席子织好后，挂在席机上，像是一长条青色的绸缎。待割掉两头多余的部分，织席就差不多完成了。织好的草席还要晒干，用布头刷去表面毛糙的部分。

最后就是排席和修边。席子晾晒后，平放在桌面上，去掉毛屑，用手掌把编织后的草往一个方向推，席子变得更结实了，然后把排露的“席筋”打结扣牢，最后卷成筒状。这是供销社的活，一般人没这手艺。村里有个排席高手，经过他的手，席子变得紧实、美观，感觉一下上了个等级和档次。

那时，根据每次叉入席草的数量，可以分为花席和双草席，花纹和宽度各有不同。手工制作草席的工艺比较复杂，道道相连，环环紧扣，马虎不得。村民的手艺多是世代相传，很多人自年少时就学做草席。席子多是卖给供销社的，要分等级。

母亲原来是镇上的居民户口，从小没干过农活，悟性也不算高，嫁到农村后，从头学起。她和奶奶一起做的席子只能是丁级，而奶奶和别人合作做的席等级能高些。做席很多是夫妻搭档，手脚利索的话，一天干10到12个小时，能编制出3条席子。这样每人每天能挣1.5元到2元，做席是一笔不小的家庭收入。

手工制作的草席柔软光滑，夏季睡前用清水擦拭一遍，睡时清爽凉快。席子吸汗，不粘身，十分舒服。如果平时保养得当，席子寿命可达15年到20年之久。老家还有好几条用了20年的老席子。

现如今，本地的席草已经被蔺草所取代，手工做的席子也被机器制作的蔺草席代替了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延续千年的草席编织技艺眼看着就要失传了。

草席荣千年，愿能世代传。

此花非彼花

——从旧时的花行说起

老照片

桑金伟

棉花进厂加工

剥棉花

(桑金伟 摄)

说到“花行”，年轻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鲜花，而老一辈人能无误地联想到我要说的是棉花。

“花行”就是棉花收购商行。早年“三北”乃至浙东沿海一带棉花遍植。1954年，国家在“三北”设立主产棉花的（新）慈溪县，可见当时棉花生产形势之紧迫、棉花收购供应之重要。

我国栽植棉花历史悠久，至少在汉代已有栽培。滨海围海造田后最宜种的是棉花，因此宁波是较早推广种植棉花的地区之一。据南宋嘉泰《会稽志》载：“姚江濒海，沿海百四十里，皆木棉。”到了元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年），置浙东木棉提举司于余姚，余姚约有70%农民从事棉花种植。到了明代就有“每至秋收，贾集如云，东通闽粤，西达吴楚，其息税以百万计”之繁忙景象。又据载，1947年，余姚、慈溪、镇海、鄞县、象山共植棉80.59万亩，产皮棉19.06万担。

“花行”之称（有时也称作“花庄”）应该是来自方言，但使用地域很广，超越了家乡方言区域。从资料上看，其他省（市）过去也使用过“花行”的称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棉花实行统购统销，才渐渐普遍使用“棉花收购站”之类的称呼。

品味方言也颇有意趣。当我们说到棉花收购时常说“花行”，而不说“棉行”；说到种棉农民时则常说“棉农”而不说“花农”；而说到种棉的田地时既可说“棉田”，也可说“花地”。显然“棉”与“花”既能通用，又有分别。

在棉花生长的前期，棉农干得最多的是“削花草（即削地）”，就是削去棉花地上的杂草，同时也为了土壤保墒，这很重要。每次雨后就要削一次地，这要抢时间，很辛苦。儿时有首顺口溜常挂在我们嘴边：“柘蠊（知了）喳喳叫，懒惰老银（老婆）困懒觉，男人地里削花草，回到家里饭未烧，蓬呀蓬呀敲稻草。”烈日当头，丈夫削花草回家欲进餐，但见老婆懒睡炊事未动，又不敢面斥，只得敲稻草以泄愤。至今，当正午知了在树上高鸣时，我的脑海中总是会闪出这串顺口溜。

棉花生长期较长，光从开花到采摘需50天左右，于是三北有老话说“黄花到白花，七七四十九天上轧车”，句中的“黄花”是指棉花的花，“白花”当是棉花的最后收获物籽棉。其实同一株棉花的花儿有黄的、红的、淡绿的多种，确实不难看。

这些关于棉花的顺口溜和老话还有很多，我想它们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记忆和感受，是本地百姓的集体记忆和感受。

有人说，起初棉花是作为一种观赏花卉引入我国的，对此我不敢肯定，也不能贸然否定。但从棉花名称的演变过程来看，似乎有些道理。

从大量的志史和古诗中可以得知，古时往往称棉花为“木棉”“吉贝”。如成书于民国年间的《余姚六仓志》仍将棉花称为木棉：“木棉产海滨沙地。有大树种，南阳种，花黄实大，其衣厚。槿黍花种，花有黄、白、红、紫四色，实小而繁，其衣薄。产额岁以数百万计。”明末大诗人吴伟业作《木棉吟》说：“眼见当初万历间，陈花富户积如山。福州青袜鸟言贾，腰下千金过百滩。看花人到花满屋，船板平铺装载足……昔年河北载花去，今也栽花遍齐豫。北花高捆渡江南，南人种植知何利……”慈溪的近现代乡贤诗人胡丛卿在《木棉歉收》诗中叹息道：“木棉大利倍桑麻，第一姚江出产夸。太息年来风雨恶，秋花总是可怜花。”胡诗不仅道出了当年广种棉花的道理——“大利倍桑麻”，又说出了现在慈溪放弃多植棉花的因由——每每摘棉时淫雨霏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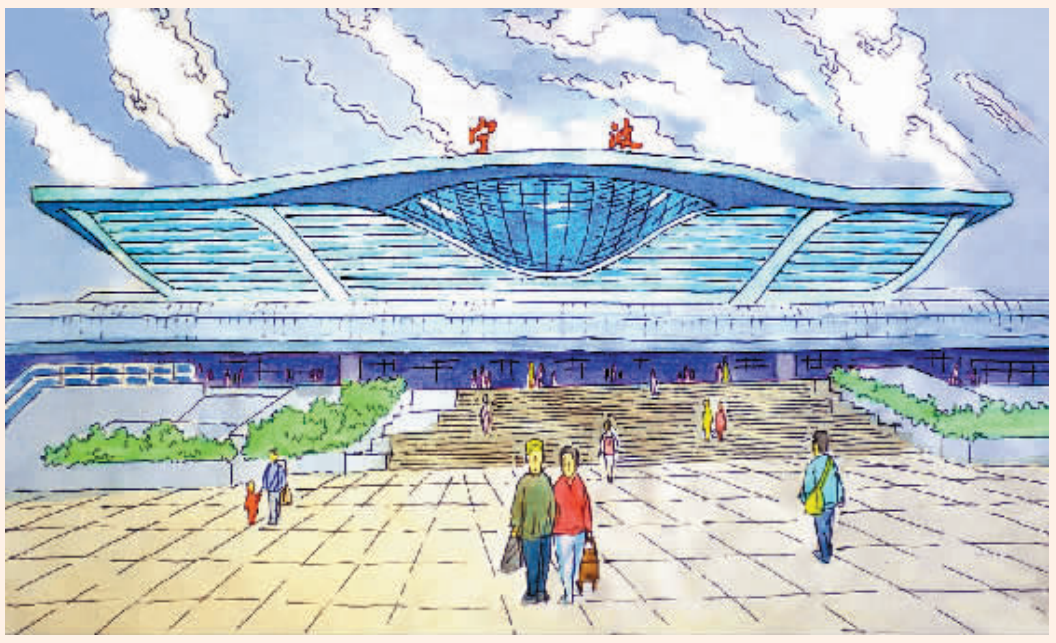
吉贝别称美洲木棉、爪哇木棉，属木棉亚科，中国大陆的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海南等省也有种植。吉贝是古代东南沿海对棉的一种称谓。清代诗人高杲在《吉贝花叹》中写道：“吉贝花，吉贝花，利普海疆胜丝麻。四月始下种，七月花开陇。白露一零雪球拥，松江淮北棉不重。浙花出余姚，群芳谱中特选挑……”

木棉树别称攀枝花、莫连、红棉等，它是漂亮的落叶大乔木，能成景观。虽然，旧时所称的木棉与现在所呼的木棉树是两个不同的物种，但两者还是有相同之处的。夏季木棉树果荚开裂后，果中的棉絮随风飘落，如六月雪一般，别有一番情趣。木棉棉絮质地柔软，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织衣材料。从这一点讲，古人把棉花称为木棉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说了一圈，还是回到“花行”。据载，旧时光三北的周巷、浒山、逍林三地就有花行50家左右，其中浒山至少有10家。

浒山西门杨玉兴花行较有名，它与宁波早年工业的代表“三枝半烟囱”之一的“和丰纱厂”有联系，抗日战争前，和丰纱厂干脆设分厂于杨玉兴花行附近。

浒山当时最大的花行叫“裘复盛”，主人是裘福钿，字唐元，从慈北裘市一带迁居至浒山，后来主营“花行”。裘唐元经营有方，被推为姚北棉业会会长。生有四子：长子鸿昌，次子鸿灿，三子鸿正，四子鸿泉。长子裘鸿昌继父业所开花行叫“裘昌记”，规模较大。裘鸿昌生有三子：长子尧庭，次子尧根，三子尧鉴。次子裘尧根继祖业，所开花行叫“天利”。直到1952年天利花行歇业后，这个三代相传的花行，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


甬城绘

宁波火车南站

一座火车站，就是城市的一张脸孔。

宁波火车南站兴建于1959年，期间经历过1988年翻建、1998年改扩建。现在的火车南站是在老站房的基础上于2010年10月改扩建、2013年12月正式启用的。扩建后的火车南站新增5万平方米的站房、8个月台和14条站场轨道，面积比改建前扩大16倍多。站内实现火车、地铁、公交的零换乘。特别是站房顶部的“天一生水”的水滴造型已经成为火车南站的象征，是甬城文化的一部分。

(丁安 绘)

消失的望春桥村

罗樱波

初识望春桥村纯属偶然。新千年伊始，骑着自行车经过西郊铁路，一路往西，见一小弄狭窄幽深，便扭转车头欲一探究竟。骑在村子的主干道上，因路面不平很是颠簸。窄窄的路面被两边的房子阻挡，照不到阳光，显得阴冷、逼仄，村子在萧条的季节里显得冷清、寂寥。路边三三两两的人声发出外地口音，和这个城市拉开着距离。这就是我对望春桥村最初的模糊印象。

搬家后，坐公交车必经望春桥村站，一次次地报站，车窗外的村子一闪而过，不断加深其在我心中的印象，催促着我去深入认识它。2005年初春，我带着相机缓缓步行于此。见村子多两层楼房，无论是水泥墙面还是木结构屋子，都十分陈旧，显示出久远的年代感。主干道北侧房屋接壤望春路，多小弄堂，因弯曲显得神秘、幽深，特别是一条分支的小水道向北曲折延伸而去，给人无限遐想。南侧房屋临西塘河，望春桥北接村子中部，桥南是另一片密集、交错的老房子。

昔日望春桥村

很多次站在三眼桥上远望古老的望春桥，感动于它能保存至今(河东面的另两座石拱桥——西成桥、大卿桥早已不复存在)，感叹在桥缝里生存了多时的古树。那天，望春桥在经受又一次维修。站在桥上，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今昔对比：远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，近处是国画般的枕水江南。凝望着河面，水面上泛漾起全祖望在《鄮西竹枝词》中描摹的无尽诗意:“望春桥上望春波,草绿苹香凫鸭多。最是城西好风景,夕阳处处起田歌。”

随着轨道交通一号线的开建，望春桥村被陆续拆除了。昔日临街卖小家具的、修电瓶车的、卖蛋糕的市井人烟，被平坦的方块水泥路和不成熟的绿化所取代。望春桥、亭被完善地修缮、保护，公交车站仍旧保留了旧时地名。一号线望春桥站的外观采用坡顶屋面和马头墙元素，延续了原址的风味。

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，我专门去找寻望春桥村可能遗留下来的旧时痕迹。在望春桥的东面，暴露着一条狭长的水泥路，路边矗立着几根光秃秃的电线杆，断墙败垣中草深树茂，往日的蜿蜒水道完全裸露着，一块保留完整的清水墙掩映在落尽叶子的苦楝树中，平整的小石板桥边依偎着完整的河埠头。清寂的废墟默然地诉说着曾经的生活轨迹与时间的流淌，一个又一个保存完好的河埠头边，似乎又响起了浣衣声、淘米声、洗菜声……

古镇打更人

光 阴

鸣 哗

旧时，夜阑人静的大碶古镇上，每隔两个时辰就会传来敲击竹筒和铜锣的打更声。

清同治年间，大碶街上连连失火，虽然民众用火慎之又慎，可火灾还是频频发生。为了断绝火患，镇上的头头脑脑们采取了多种相应的措施：在碶上墩的西隅建造了象征以水克火的南安亭；每家每户备有太平缸（盛满水的缸）；再旱的年头，街边的河中必须留有太平水；还设立了具有从德国进口半机械化“水龙”的救火会，其中打更也是防火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
日月递嬗，打更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从我记事起的20世纪40年代中末期，镇上打更的是一个叫金阿郎的小老头，人们惯称他“打更阿郎”。阿郎家住横街的汤家桥边，他每晚天昃暗时就开始打头更，从一更到东方发白时的五更，每夜要打五次。打更时，阿郎胸前挂一个比腰鼓小不了多少、中间镂有一道口子的毛竹筒子，左手挈着一面铜锣和一盏灯笼，右手握着木槌，敲着竹筒和锣。那竹筒发出的“噗噗”声浑厚而响亮，是报更打花点的辅助声，竹筒声后的锣声才表示更数，一更一声锣，五更五声锣。“噗、噗噗噗噗、噌”（一更），敲毕即引吭高叫：“家家户户，灶前灶后，楼上楼下，火烛小心，日夜保太平呵！”

阿郎打更轻重顿挫、节奏稳定，似歌的防火呼叫声悠扬而有韵律。他每次打更从自己家的汤家桥出发，经横街、上街、中街至下街毕家碶，再从关圣桥到后浦街达南安亭，过碶上墩进入东街，巡遍古镇的全街。他的打更声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中一直传播到古镇周边的村落，及时提醒着百姓安全用火。

阿郎打更从不误点差时。夏天穿一件有补丁的夏布对襟衫，脚踏草鞋；冬天头戴“罗宋”帽，穿着人家送的一件宽长的老棉袄，腰中系着一条布带；雨天披戴着蓑衣斗笠，冷时脚上换了平时不舍得穿的一双钉鞋。不管寒冬酷暑，每夜从不间断地执行着他这神圣的任务。

阿郎穷得叮当响的家里，有一个病恹恹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，两间破屋里最贵重的物件是镇公署供给他的一架闹钟，擦得油光雪亮的摆在缺档的八仙桌上。他每月虽可领到微薄的打更费，但这些钱是难糊三张嘴巴的，故而他白天还得去打临工为人“拘差”，或为泥水（匠）木匠做下手，或为“生意人家”挑水倒便桶等，收的报酬任凭主人“随意乐助”，他从不计较。

阿郎特别喜爱孩子，只要有小孩喊他一声“公公”或“伯伯”，他往往会从破旧的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或一块印糕来，这些吃食虽然是时隔已久的“二手货”，但还是能诱惑得孩子们口水直流。尽管阿郎对孩子们一往情深，可叫他的却还是极少，并且见了他多望而却步，这倒不是孩子们讨厌他，而是怕他“噗”和“噌”的打更声。晚上不肯入睡的孩子，只要做娘的说“快睡，打更阿郎要来了”，孩子就会立马消声就寐。他对这些娘们以他的名分威胁孩子既不理解又不满，也对自己的行当感到苦恼。解放前夕，他毅然交上闹钟，掼了锣槌。

接替阿郎打更的是个50多岁的黄岩人，拐着一条腿，租居在后浦街王家。因为是外乡人，大家多不知他姓甚名谁而称作“黄岩人”。“黄岩人”打更后不用敲铜锣了，只敲着“噗噗”的竹筒，但呼叫的还是阿郎传下来的防火老调子。他个子小小的，喉咙倒响亮而清脆，虽带着黄岩口音，韵律却比阿郎更具艺术性。每夜五次跛着一拐一瘸的腿，兢兢业业地在古镇的老街上按时巡弋。

直到1952年，大碶镇上实行了民兵巡夜制，持续了80多年的打更声从此销声匿迹。